

# 精准扶贫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调查研究<sup>\*1</sup>

李丹 杨璐 何泽川

**【摘要】**:精准扶贫要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根据贫困多维性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从物质、安全、能力、公平、尊严五个维度构建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理论模型,用之对贫困地区彝、藏等少数民族精准扶贫现状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民族习俗、行为等区域人文内生性因素及精准扶贫政策等外生性因素,影响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因此,应加强全方位的多元主体扶贫参与,完善反贫困协同治理机制,兼顾民族地区区域性贫困与差异化贫困,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以保障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

**【关键词】**:精准扶贫;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五维一体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8)03-0057-06

据统计,2016年少数民族八省区402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人口总数从2015年底的1813万下降到1411万。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却缓慢上升,从2011年的30.4%升至2016年的32.55%。<sup>[1]</sup>民族地区依然存在困难群众多、群众困难多、贫困程度深、脱贫任务重的现实,且与汉族地区人口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sup>[2]</sup>因此,在新一轮脱贫攻坚战中,民族地区依然是当前及未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关键战场。

国内外研究表明,贫困具有多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Sen)在可行能力贫困论基础上拓展多维贫困理论,<sup>[3]</sup>认为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这种剥夺受多重因素影响,以此展开对多维贫困的测量研究。Alkire和Foster提出了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sup>[4]</sup>王小林和Alkire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维度分解结果表明,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sup>[5]</sup>经测算,收入贫困的概念遗漏了69.38%的多维度贫困户。<sup>[6]</sup>许源源认为农民的贫困还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缺少所有权、劳动所得缺乏保障、缺少交换的机会和环境等方面。<sup>[7]</sup>民族地区生产结构单一,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以及自然条件恶劣,多维贫困问题尤其突出。<sup>[8]</sup>遗憾的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多维贫困问题,目前我国相关研究相对少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贫困维度及贫困程度的测量、贫困影响因素、扶贫效益评价等方面,尚缺少通过对扶贫对象的主观满足感的考量,来评价扶贫的精准性与有效性的相关成果。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人文地理、宗教信仰、生态资源与政策约束,民族人口具有独特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主观“获得感”及其影响机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从理论上,有助于揭示贫困人口获得感构成维度、影响变量及其互动关系,从而构建精准扶贫背景下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理论模型。从实践上,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检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成效的人本指标,从而有助于完善脱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找到从物质脱贫、心理脱贫到精神脱贫的现实路径,为地方政府的扶贫实践提供前瞻性指导与参考。

## 一、“五维一体”: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理论模型

<sup>1</sup>**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及扶贫对象‘获得感’问题研究”(16BMZ076)、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研究专项“贫困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skqy201309)

**作者简介**:李丹,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璐、何泽川,四川大学中国公共部门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成都610064)

### (一) “获得感”的内涵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sup>[9]</sup>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提出“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获得感”。<sup>[10]</sup>将精准扶贫成效落脚于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获得感”本意指获取某种利益后的心理满足感,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sup>[11]</sup>还包含尊严、公平图1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扶贫对象“获得感”综合理论模型公正等权利。“获得感”十分精准地定位了精准扶贫给扶贫对象带来的主观满足感,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内涵。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在精准扶贫脱贫过程中,经由物质条件改善、能力提升及人际互动等所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和主观满意感,即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扶贫对象的“获得感”。

### (二) “获得感”理论模型

基于上文对“获得感”内涵的界定,分析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扶贫对象“获得感”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以及影响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及其构成要素,便形成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扶贫对象“获得感”的综合理论模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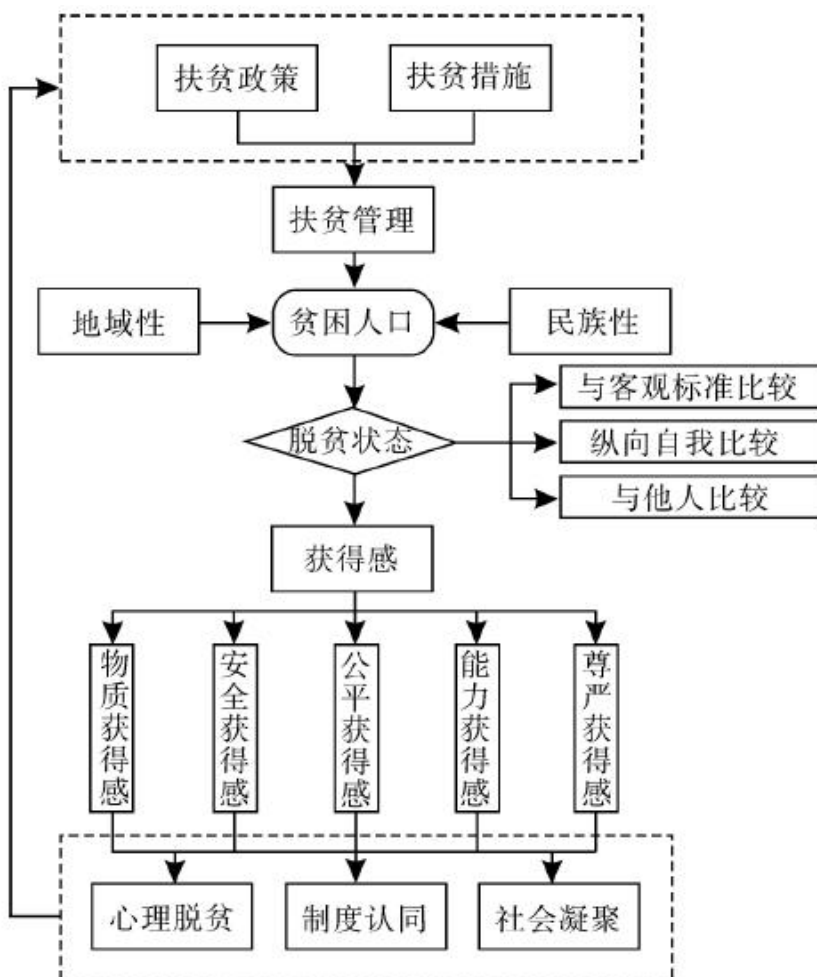


图1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扶贫对象“获得感”综合理论模型

图1模型展示了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经由系列扶贫政策、措施及实施过程的输入影响，并在民族地区特殊地理生态及特定民族文化习俗等因素的间接影响下，贫困个体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形成可感知物质、安全、公平、能力和尊严五个维度的获得感，从而构成物质、心理与精神三个层面、“五维一体”的贫困人口获得感体系。人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和基本权利早已进入贫困研究的主流。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贫困论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反贫困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当贫困对象的“获得感”从物质层面达到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提升，主动提高“缺失的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sup>[12]</sup>时，才算达到了“造血式”扶贫的目的。以下，本文从经济收入、住房、扶贫实物资料的获取等来考察其物质“获得感”；用“社会保障参与情况”及“贫困人口是否担心返贫”考察其安全“获得感”；通过技能习得与应用来反映能力“获得感”；用精准扶贫中贫困人口能客观、积极地认识自我的贫困状态，主动地参与扶贫项目，对政府的依赖性低并有较强的自我发展意识与行动来分析尊严获得感。

## 二、案例分析: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影响因素

### (一)调查抽样及调查地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法及观察法收集一手数据，调查地点位于国家级民族贫困地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016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课题组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运用分层随机方法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甘洛县不同年份脱贫的贫困村进行抽样。综合考虑人员流动、样本代表性等多方面因素，最终选取凉山州越西县大花乡、拉普乡，甘洛县阿尔乡、拉莫乡、嘎日乡共计11个彝族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调研，发放调查问卷80份，收回有效问卷73份，调查覆盖329人，均为彝族。2016年8月对阿坝州的调研则重点面向项目扶贫和旅游扶贫情况，选取了红原、理县两县4个旅游开发较好的村落作为抽样点，以户为单位开展调查。由于调研阶段正值牧民远牧期，在家人口少，发放调查问卷21份，收回有效问卷15份，涉及贫困人口73人。两州调研均采用调查人员入户一对一访谈式，调查对象均为精准扶贫中的少数民族建档立卡贫困户。

总体来看，四个调研点都属于四川边远西部高海拔地区，甘洛县和越西县以高海拔山地为主，两县缺乏支柱性农业产业，农业种植以土豆、玉米等为主，部分地区发展烤烟种植，但规模不稳定，贫困户增收压力较大。红原县、理县则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生态资源丰富而脆弱。红原县的草原旅游业已初具规模，牦牛养殖、加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为当地贫困人口脱贫奠定了一定的创业就业条件。

### (二)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特征

1. 质量数量特征。首先，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具有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抚养比高、家庭劳动力不足等特征。以凉山州两县为例，接受调查的73户贫困人口中，68.5%完全不识字，其余基本上只上过一两年小学，仅2人接受高职及以上教育。汉语普及程度也不高，绝大多数被访谈者仅能用彝语进行交流。其次，凉山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超生现象严重，加大了贫困家庭抚养压力及农地资源的紧张。2014年凉山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49%，比全国高出3.53%，比四川平均水平高出5.13%。越西县拥有农业人口32385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1.86%，甘洛县农业人口占比为92.8%。由于经济承受能力差，教育发展滞后，低质量的人口再生产，容易导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即使在人口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凉山州的大多数贫困户家庭仍存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劳动力匮乏与贫困人口的营养健康状况、抚养压力密切相关。营养状况差、年老、患病、残疾等原因削弱了家庭劳动力供给。在贫困人口对家庭致贫原因的自我评估中，农业收入低、家庭劳动力不足、家庭成员患病或残疾、劳动力教育水平低或缺乏技能成为其最主要的选项。

2. 行为与习俗特征。凉山州两县还保留着该区域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态和民族文化传统，红原地区则盛行传统的游牧文化。这些文化特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进而影响到扶贫脱贫的成效。这种情况在凉山州表现尤甚。“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共产平均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忠守故土的乡土观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sup>[13]</sup>是时任凉山州喜德县代理县长的曲木伍牛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客观写照。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也部分印证了上述说法。凉山州贫困人口具有亲缘、地缘关系紧密，社区内互动互助频繁，同社区内部不歧视贫困（区别于不同家支及不同血缘间的歧视），被动型扶贫等行为特征。通过对贫困人口日常生活的观察和问卷调查，90%以上的贫困人口与亲戚、邻居、朋友在劳动互助、帮忙办事等方面有密切互动，84.6%的贫困人口与亲戚朋友发生资金借贷关系。而在彝族乡村社区层面，因贫困而受到乡邻歧视的情况较为罕见，91.8%的贫困人口感觉乡邻间基本不存在歧视。一方面，这反映了贫困人口在社区层面的公平感程度较高，社会支持网络较为稳固；另一方面，重义轻利的伦理观也支持了这一现象。

同时，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呈现出被动型扶贫的行为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凉山州 65.8%的贫困人口认为政府帮助比个人努力及能力更重要，55%认为脱贫必须依靠政府，其原因也在于贫困人口的能力“获得感”不足，仅 41.1%认为自己能力会增强，受劳动力人口城镇化流动、农忙时令或游牧季节的影响，许多贫困户未能参与政府组织的各项培训。另一方面两州贫困群体的社会参与尤其是公共事务参与度不高，主动向政府表达过自身意见或提出诉求的贫困户不足 10%。

### (三)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影响因素<sup>[14]</sup>

1. 直接的物质或生产资料的帮扶使贫困人口有更强的物质“获得感”。调研发现：直接发放给贫困户的补助、物品、生产资料等更容易使其形成较强烈的物质“获得感”。当问到“家里得到了哪些帮助”时，回答最多的是：“之前村上给我们发了 200 株核桃苗，有个领导来看我们，送了我们鹅苗，还有一次发了些粮油。”而在生产资料未发放到户并且开展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的村，如“借羊还羊”的甘洛县 EK 村和开展酒店入股项目的红原县 X 村，有贫困户表示并不知道那是扶贫项目，甚至自动放弃加入该项目，因而没有感知到自己获得了帮扶，61.6%的贫困户表示精准扶贫暂时未带来经济收入的提升。由此可见，直接到户的物质扶持对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具有较强刺激，而一些短期内未见效益，或具有不确定性收益的项目则难以使贫困人口感受到帮扶。

2. 低保的兜底作用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安全“获得感”。低保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障贫困人群的最低生活需要，即“兜底线”。2016 年，国家民政部强调，要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兜底保障作用，要推动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在对象识别上的衔接、优惠政策共享及信息平台链接。<sup>[15]</sup>凉山州精准扶贫“七个一批”提出“低保兜底一批”，此处的低保包含农村低保，农村五保供养，贫困残疾人、孤儿、特殊困难儿童等在内的多重社会保障兜底政策。

坡足热呷是甘洛县 JB 村村民，是该极度贫困村 16 户建档立卡户之一，也是全村仅有的两户失依儿童家庭之一。坡足热呷及老伴均近 70 岁，而三个孙子中最大的仅 10 岁。两位老人不仅因为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还患有慢性疾病。一家人的生活全部依靠政策兜底，农村低保、特殊儿童补贴、住房补助等多项社会救助保障了一家五口的基本生活。低保的兜底作用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体现。坡足热呷的妻子告诉我们：“我们两个老年人年龄都较大了，种地之类的都没有办法，孙子现在读书都不要钱，只有最大的孙子每个月要给他点生活费。”同行的村干部表示：他们一家的情况，只能依靠低保的持续兜底。<sup>[16]</sup>还有部分村民表示，医保的报销比例较低，家庭医疗负担较重，如果家庭成员生病，即使脱贫后也可能导致返贫。可见，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还不高，低保制度为贫困户构造了最后一道安全网，是否有低保成为影响其安全“获得感”的关键因素。

3. 不同民族区域文化特征对贫困人口能力及尊严“获得感”的影响呈现差异。世界银行 2000 年发展报告将贫困定义为“缺失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期望一方面通过技能技术培训使贫困人口获得谋生能力，一方面通过形成“好习惯”与“好风尚”使贫困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然而能力与尊严的获取与贫困人口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动力，以及劳动积极性密切相关。调研显示，两州的贫困人口均认为孩子的教育很重要，却在自身能力提升上看法不同。在凉山州，对“您觉得技能培训与物质扶贫相比，哪个更重要？”的回答，35.6%选择技能培训更重要，37%认为物质更重要，其余的认为同样重要。而在

阿坝州，选择物质扶贫更重要的户数为0，15户贫困家庭中，11个样本选择了同等重要。同时，阿坝两县贫困人口对政府的依赖性相对较弱，仅6.7%的贫困人口认同政府帮助比个人努力及能力更重要，凉山两县认同者则达到了65.8%。阿坝贫困人口对政府依赖较低，自我发展意识强，热爱劳动，有积极致富的愿望，反映了更强的尊严获得感。

理县桃坪乡DS村一位贫困户告诉我们：因汶川地震，他们全家从对面山头搬到现在的居住地，原有生产资料与居住地分离，现在家里没什么土地，与搬迁前相比，其生产资料大大减少。为进行农业生产，她千方百计开荒开拓了一片土地。而其周围的居民，也在不断为提高经济收入做出各种努力，村干部告诉我们：“比勤劳是我们这里的风气，农民一年四季都在忙各种活路。”

相对而言，彝区具有较明显的贫困内卷化特征。笔者认为，这与其历史遗留的民族习俗、生活方式及自我发展意识不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得过且过的生活观”“乡村平均主义”影响到凉山贫困人口能力与尊严的“获得感”，使得他们对政府扶贫有更高更多的期望。

4. 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影响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公平“获得感”。调查显示，精准扶贫中建档立卡户普遍公平“获得感”较强，但没有被评为贫困户的“边界户”却往往感觉不公平。凉山彝族自治州贫困面大，农户之间经济差异极小且难以精确量化，找贫易而选富难。扶贫“指标限定”导致建档立卡户无法实现全覆盖，因而边界户不公平感强烈。如我们调研的越西大花乡SG村、甘洛县嘎日乡JB村等都是极度贫困村，但贫困户指标有限。此外，也不排除因人情关系出现的评选不公的情况。

在越西县大花乡WE村的调研中，一名彝族青年一直在受访者旁边提醒受访者要真实回答，激动地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大家心里清楚啊。”旁边一位老者则形象地表达其主观感受：“我们是非常相信国家的政策都是好的，精准扶贫政策就像是注在注射器里的药水，我们相信它是对我们的贫穷是有疗效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打针的人却把这种注射器打在了不应该打的人的身上，或者是剂量上有所偏差。”而在相对富裕的阿坝州理县某村则出现“选贫难”现象，村干部在反复调低农户收入数据的前提下才凑够县上拨下来的贫困户名额。在自上而下的“指标配额”模式下，跨区域间及同一社区里出现了评选及待遇不公平，即符合条件的目标群体没有全部受益与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扶贫福利两种现象并存，从而影响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施的公平性。

### 三、多方着力激发主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

多维的贫困及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决定了民族地区反贫困道路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扶贫项目的选择、贫困户的瞄准、政策实施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性以及贫困人口自我发展意识均直接影响到贫困人口的获得感，从而影响精准扶贫的最终成效。基于精准扶贫可持续理念及提升贫困对象获得感的目标，笔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

#### （一）强化全方位的多元扶贫主体构建，建立高效的反贫困协同治理机制

目前政府、行业、社会及东西部结对帮扶的扶贫大格局业已形成，然而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还明显存在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在政府主导下，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及知识资源，加强全方位的多元扶贫主体构建，尤其需要统筹利用第三方社会力量，以弥补基层干部力量不足。具体而言，一是继续深化对口帮扶机制，落实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与发展能力提升。二是引入专家智慧参与扶贫辅助决策与评估，提升精准扶贫的公平性。三是鼓励公益慈善基金进入民族地区帮扶扶贫，扩大扶贫资金来源。四是健全反贫困协同治理机制，减少主体间的摩擦成本，在保障扶贫投入边际收益的基础上，提高精准扶贫的整体绩效。

#### （二）兼顾民族地区区域性贫困与差异化贫困，保障扶贫政策实施过程及结果的公平性

公共政策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公平价值缺失和偏差是我国目前利益冲突、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sup>[17]</sup>

---

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平程度是影响贫困人口公平获得感的主要因素。贫困对象对精准扶贫政策公平性的感知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环节及扶贫政策的实施方式与结果中。因此，不仅应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将扶贫事权下放，监督权上提，激发村级自治活力，设计政府购买服务，吸纳专业机构参与家计调查与评选结果监督，保障贫困户识别的公平性，建立贫困户动态监测评选机制，还应分户施治，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将无差异化区域扶贫政策与差异化家庭帮扶有效结合，兼顾区域性扶贫与重点对象扶贫，尽量消除边界户的不公平感。

### (三)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从根本上构筑贫困人口获得感

精准扶贫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扶贫政策与手段实现贫困群众可持续生计与发展，是发展式扶贫之要义。贫困群众既是扶贫的对象，也是参与主体。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精准扶贫应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提升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针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人才匮乏、教育需求强而优质教育资源贫瘠的现状，应进一步健全“9+3”免费教育计划，提高招生覆盖面及学生的补助水平。<sup>[18]</sup>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一村一幼”项目，农民夜校扫盲项目，农业技术培训及实用技能培训项目等，切实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与技能培训的精准性，全面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消除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更重要的是，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持续增强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意识，构筑其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内核，倡导“义”“利”均衡观、消费理性观和科学生育观等，培育其行为上的自我规划与自我控制能力，树立脱贫致富的标杆，营造民族社区内的正能量，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

#### 注释：

[1] 监督检查司：《〈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6)〉在京发布》，2017年3月21日，[http://www.seac.gov.cn/art/2017/3/21/art\\_7191\\_277501.html](http://www.seac.gov.cn/art/2017/3/21/art_7191_277501.html)，2018年1月12日。

[2] Bjorn Gustafsson and Li Shi, “The Ethnic Minority-Majority Income Gap in Rural China during Trans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Vol. 51, No. 4, 2003, pp. 805–822.

[3]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Sabina Alkire and J. Foster,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OPHI Working Paper 7, UK: 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2008.

[5] 王小林、Sabina 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12期。

[6] 冯贺霞等:《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分析》，《劳动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7] 许源源:《社会组织如何救济贫困农民:权利理论的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8] 李俊杰、李海鹏:《民族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扶贫政策创新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9]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2月27日。

---

[10] 《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2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7/c\\_111738398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7/c_1117383987.htm)，2016年12月30日。

[11]王斯敏、张进中：《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光明日报》2015年3月14日，第5版。

[12]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9.

[13]曲木伍牛：《凉山彝族自治州贫困问题研究》，2016年8月4日，<http://lsygdz.lsz.gov.cn/gztt/gztt0601.htm>，2016年12月30日。

[14]文中引用言语由笔者2016年7月18日—8月5日在越西县、甘洛县、红原县、理县调研访谈资料整理而成。下同，不再另注。

[15]《中国民政》编辑部：《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如何衔接？》，《中国民政》2016年第5期。

[16]李丹、杨璐：《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有效衔接是实现政策兜底的关键》，2016年10月9日，<http://www.jingzhunfupin.com//column/lanmu4/lilunyanjiu/2016/1009/9638.html>，2016年12月30日。

[17]任勤：《公平的公共政策是利益整合的关键》，《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8]李丹、何泽川：《四川凉山彝区“9+3”：现实与未来》，2016年10月9日，<http://www.jingzhunfupin.com//column/lanmu4/lilunyanjiu/2016/1009/9637.html>，2016年12月30日。